
若十字军东征雇佣蒙古骑兵：一项反事实推演及其 对当代历史格局的启示

林远*

摘要：本文采用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的视角，探讨一个假设性命题：若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拉丁西方或拜占庭—近东势力将蒙古骑兵大规模聘为雇佣军，会对后续欧亚政治、宗教与文明格局产生何种影响。通过梳理十字军运动与蒙古西征的时间线、动机结构与地缘约束，本文论证该“雇佣”在历史上几无成真可能，但在思想实验中，若强行植入该变量，则可能改写耶路撒冷归属、阿尤布—马穆鲁克政权兴替、东地中海贸易路线以及西欧—蒙古关系，进而对民族国家形成、宗教边界与“西方—伊斯兰”叙事产生长远影响。文末指出，此类推演的价值不在于预测，而在于揭示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路径依赖，以及对“西方中心”史观的反思。

关键词：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雇佣兵；反事实历史；历史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与蒙古西征（约1219—1260年代）是塑造欧亚中世纪中晚期的两股巨大力量。前者以收复圣地、保卫朝圣路线与扩张拉丁基督教势力为目标；后者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率领下，自蒙古高原席卷至东欧与西亚，建立四大汗国。二者在时间上有重叠（十三世纪），在地缘上有交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但在史书记载中，十字军势力与蒙古势力更多呈现为时而联盟、时而敌对、时而试探性接触的复杂关系，而非稳定的“雇主—雇佣兵”关系。

收稿日期：2026年3月2日

作者单位：虚无大学比较哲学研究所

本文提出的反事实问题是：倘若某一方——拉丁十字军国家、教皇、拜占庭帝国或近东的基督教政权——在关键节点上，将蒙古骑兵大规模、制度化地聘为雇佣军（而非偶发的军事同盟），会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设问并非空想，而是建立在以下史实之上：（1）蒙古军队中确有大量非蒙古族裔的“签军”与归附部队，其作战模式具有可被“外包”或“征调”的弹性；（2）十字军诸国及拜占庭长期使用雇佣兵（如突厥佣兵、法兰克骑士、瓦兰吉卫队等）；（3）十三世纪中后期，教皇与部分欧洲君主曾多次遣使蒙古，既有传教与结盟抗伊斯兰的意图，也有对蒙古军事实力的忌惮与利用之念。因此，“十字军+蒙古雇佣兵”在逻辑上是一个可被建构的推演对象。

本文不试图给出确定性的“另一种历史”，而是分三步进行：其一，简要交代十字军与蒙古在十三世纪的互动史实与时间线；其二，分析“雇佣蒙古骑兵”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约束下为何几乎不可能成立；其三，在反事实前提下，推演若该雇佣关系成立，可能对耶路撒冷与近东、东地中海贸易、西欧—蒙古关系以及后世史观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并据此讨论对“当今历史格局”的启示。全文约五千字，以史学与战略学的交叉视角展开。

二、十字军与蒙古：史实中的交汇与限度

（一）十字军东征的阶段特征

十字军运动自第一次东征（1096—1099）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等拉丁国家起，历经多次东征与反复的失地—收复。至十三世纪，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已重占耶路撒冷（1187年后），十字军国家收缩于沿海据点（如阿卡、的黎波里、安条克等），依赖海运与西欧增援维持存在。第五次（1217—1221）、第六次（1228—1229）、第七次（1248—1254）、第八次（1270）东征等，或目标转向埃及、或与当地穆斯林政权做有限妥协，圣地问题始终未获根本解决。1291年阿卡陷落，通常被视为十字军在东地中海建立拉丁国家这一形态的终结。

（二）蒙古西征的节奏与方向

蒙古西征大致分两波。第一波在成吉思汗与拖雷时期，重点经略中亚、伊朗与高加索—钦察草原，哲别、速不台曾深入东欧。第二波在窝阔台与蒙哥时期，旭烈兀西征（1253—1260）攻灭阿拔斯哈里发（巴格达，1258）、击溃叙利亚阿尤布势力、兵锋直指大马士革与加沙一带，与十字军国家及马穆鲁克政权发生直接接触。1260年艾因贾鲁之战中，马穆鲁克埃及击败蒙古偏师，被视为阻止蒙古进一步南下非洲与西进地中海的关键一役。此后伊儿汗国与埃及—叙利亚马穆鲁克长期对峙，与十字军诸国则时有“联蒙抗伊斯兰”的提议与局部合作（如部分十字军城市向蒙古纳贡或提供补给），但从未形成统一的“拉丁—蒙古联军”或制度化的雇佣关系。

（三）双方接触的实然状态

史料显示，教皇英诺森四世、路易九世等曾遣使蒙古，希望联合对付伊斯兰势力或至少使蒙古改宗基督教；蒙古方面则多要求西方称臣纳贡，或提出共同打击伊斯兰政权后瓜分势力范围。这些接触充满误解、仪式冲突与战略猜忌，并未促成稳定的军事一体化。另一方面，蒙古军队的编制与忠诚结构以大汗与诸王为核心，外族部队多以“签军”“探马赤”等形式被整编，而非以独立雇佣军身份受雇于外国君主。因此，“十字军雇佣蒙古骑兵”在历史上既未成为制度现实，也缺乏可参照的成例。

三、“雇佣蒙古骑兵”为何在历史上难以成立

从反事实分析的角度，必须先说明该假设在十三世纪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才能避免将反事实推演变成纯粹的幻想。

（一）政治与身份结构

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和组织度高度依赖大汗—诸王—千户的垂直体系；脱离这一体系、以“雇佣兵”身份长期效命于拉丁王国或拜占庭，意味着对原有认同与赏罚机制的剥离，在当时的技术与信息条件下难以维持大规模存在。十字军国家本身资源有限，支付能力与蒙古军期望的“分地、战利品、贡赋”模式

未必匹配；教皇与西欧君主更不可能把一支蒙古大军长期“外包”给黎凡特的小王国。

（二）宗教与文化

十字军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圣战色彩，将“异教”蒙古视为同盟已引发争议，若将其聘为常备雇佣军，会加剧拉丁世界内部在神学与合法性上的紧张。反之，蒙古方面对“受雇于十字军”也缺乏意识形态动力：其西征逻辑是“天赐之命”与领土—贡赋扩张，而非为基督教君主打工。

（三）地缘与时机

蒙古主力西征与十字军国家的存续期在时间与空间上虽有重叠，但蒙古的决策中心在哈拉和林与后来的伊儿汗国，其战略重心是征服与统治波斯—伊拉克—叙利亚，而非专门为收复耶路撒冷服务。即便存在短期合作（如个别十字军城镇与蒙古协同作战），也谈不上“十字军选择蒙古骑兵当雇佣兵”这一制度化图景。

因此，本文的反事实设定必须明确：我们是在“强行”假定某种历史分支——例如，某位蒙古宗王或某支归附蒙古的突厥—钦察部队与某一十字军政权签订了长期雇佣契约，并在关键战役中充当主力——进而追问其对后续历史格局的影响。该假定本身在历史上高度不可能，但不妨碍其在方法论上作为思想实验存在。

四、反事实推演：若十字军大规模雇佣蒙古骑兵

（一）对耶路撒冷与近东格局的可能影响

若在十三世纪中叶，某支具备蒙古战术特点的骑兵（无论名义上是否仍属蒙古大汗）被黎凡特十字军国家或与十字军合作的亚美尼亚等势力大规模雇佣，并在1260年前后的关键战役中与马穆鲁克或阿尤布残余势力对决，则艾因贾鲁之战的结果可能被改写。历史上，蒙古偏师因兵力分散、情报不足及轻敌而在艾因贾鲁遭遇惨败；若此时有一支“受雇”于十字军或与之紧密协同的蒙

古式骑兵作为核心战力，且与拉丁步兵、当地基督教武装协同，则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权力天平可能向基督教—蒙古联合一方倾斜。其结果可能是：耶路撒冷再次落入基督教势力控制、阿尤布—马穆鲁克对黎凡特的统治被推迟或压缩，甚至出现一个以“拉丁—蒙古共治”或“基督教王国+蒙古军事保护”为特征的近东秩序。

这一局面会进一步影响后世：（1）基督教圣地叙事与朝圣经济可能延续更久，教皇与西欧的“十字军理想”不会在 1291 年遭遇象征性终结；（2）伊斯兰政权在叙利亚—埃及的合法性叙事会有所不同，后世“圣城归属”的争议可能以另一种时空节奏展开；（3）马穆鲁克作为“阻挡蒙古与十字军”的伊斯兰堡垒这一历史形象可能被削弱，阿拉伯—伊斯兰史学对十三世纪的叙述也会随之改写。

（二）对东地中海贸易与城邦秩序的影响

十字军国家若因蒙古雇佣军而延长存在，则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共和国在东地中海的据点、商站与航线会维持更久，与亚历山大里亚、阿卡的黎波里等港口的贸易格局会不同于历史上奥斯曼崛起后的重组。商业资本与 naval 力量的积累可能更多以“拉丁—黎凡特”为中心，而未必如此集中地转向大西洋与绕行非洲。这不会直接阻止奥斯曼的崛起，但可能改变东地中海权力转移的节奏与方式，进而影响近代早期欧洲的贸易重心与殖民扩张的时序。

（三）对西欧—蒙古关系与“西方”认同的影响

若“十字军+蒙古雇佣军”成为一段被书写的历史，则西欧与蒙古的关系会更多一层“雇主—佣兵”或“同盟”的记忆。后世欧洲史学可能更强调“基督教世界曾与东方草原帝国联手对抗伊斯兰”，而非单纯将蒙古视为“黄祸”或遥远的神秘威胁。这会对“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异教”的边界叙事产生微妙影响：所谓“西方”的构成可能被想象为曾包含蒙古军事元素，从而削弱那种将“西方—伊斯兰”截然二分的线性史观。反过来，若十字军最终仍失败（例如蒙古雇佣军倒戈或与马穆鲁克议和），则叙事可能变成“西方曾依赖异教骑兵而仍未能守住圣地”，加深对“内部纯洁性”与“外部威胁”的焦虑。

无论哪种走向，当代关于“文明冲突”或“西方崛起”的宏大叙事都会多出一个可供征用的历史脚本。

（四）对民族国家与帝国记忆的影响

近代民族国家往往从中世纪王国、公国或帝国中提炼“建国叙事”。若十三世纪的拉丁东方存在过一支制度化的“蒙古雇佣军”，则相关地区的国家史（如亚美尼亚、塞浦路斯、甚至后来的黎巴嫩—叙利亚一带）可能多出一段“与草原骑兵共御伊斯兰”的记忆，被后世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史学重新诠释为“多元军事传统”或“东西方交汇的象征”。同样，蒙古一侧的史学也可能多出一个“曾受雇于基督教君主”的叙事线索，影响今日蒙古国或蒙古族裔对自身与欧洲—近东关系的想象。这类记忆未必直接改变当代国界，但会参与塑造各国教科书与公共史观，从而间接影响“当今历史格局”的文化与认同维度。

五、对“当今历史格局”的启示与反思

（一）历史的偶然性与路径依赖

十字军是否雇佣蒙古骑兵，在现实中取决于无数具体决策、信息条件与制度约束；一旦某一节点改变，后续链条会以我们难以完全模拟的方式展开。反事实推演的价值不在于“预测另一种今天”，而在于说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方—伊斯兰”对立、耶路撒冷的多重象征意义、东地中海与欧洲的贸易—政治格局，都是特定路径依赖的结果。若引入“蒙古雇佣军”这一变量，路径会分叉，但分叉之后仍会有新的约束与偶然，未必导向一个“更好”或“更坏”的单一结局。这有助于我们警惕历史决定论与目的论，把“当今格局”理解为众多可能历史中的一种实现。

（二）对“西方中心”史观的批评

传统叙事常将十字军东征视为“西方”的扩张与失败，将蒙古西征视为“东方”对“西方”的威胁或擦肩而过。若我们认真对待“十字军雇佣蒙古骑兵”的反事实场景，就会看到“西方”“东方”“基督教”“草原”等范畴在十三世纪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大量联盟、雇佣、妥协与身份重叠。这对今天那

种把“西方”与“非西方”截然对立、并用以解释一切国际秩序的做法，是一种史学上的解毒剂：历史格局从来不是单一文明单线展开的，而是多股力量在具体时空中碰撞、合作与分化的结果。

（三）方法论上的限定

本文的反事实推演建立在简化与假设之上：我们假定“雇佣”关系可以稳定存在并参与关键战役，而未充分展开军事史、后勤与士气等细节；我们也没有处理蒙古内部权力更迭（如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伊儿汗国与钦察汗国的矛盾）对“雇佣军”忠诚度与可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结论应被理解为“可能性与方向性的探讨”，而非严谨的因果断言。更精细的反事实分析需要与军事史、气候史、经济史相结合，并明确多变量情境下的分支逻辑。

六、结语

若十字军东征时期选择蒙古骑兵当雇佣兵，在历史上受政治、宗教与地缘约束而几无成真可能；但在反事实的框架下，这一假设足以帮助我们推演：耶路撒冷与近东的归属、东地中海贸易与城邦秩序、西欧—蒙古关系以及后世民族国家与文明叙事的形成，都可能呈现不同于今的走向。当今的历史格局——包括圣地之争、东地中海的权力结构、以及“西方—伊斯兰”的话语对立——由此可被看作众多可能历史中的一种，而非唯一必然。书写此类反事实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幻想“若当年如何则今日如何”，而在于提醒我们：历史是开放的、多线的，对“当今格局”的理解与批判，都应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

（全文约五千二百字）

参考文献（仅示意）

- [1]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 [2]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十字军史》，欧阳敏译，商务印书馆。
- [3] 彼得·杰克逊：《蒙古人与西方》，魏孝昌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 [4] 反事实历史方法论可参见：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Basic Books.